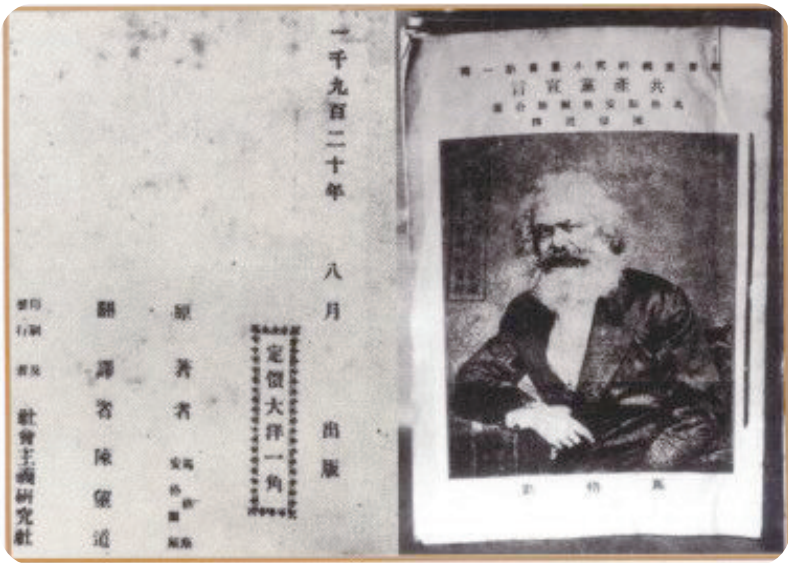


老一辈革命家 如何读《共产党宣言》

□ 王玉强



毛泽东：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1920年第一次读《共产党宣言》。这一年，毛泽东27岁。同一年，他在湖南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第二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常读、精读、细读的一本书。读了多少遍？无法统计。1939年，他对党内同志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

《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共产党人的思想武器，如同行军打仗必备的干粮、作战的武器一样，不可或缺。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两次向全党推荐5本书，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他说：“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

毛泽东不但经常读《共产党宣言》，而且读了一辈子。1964年8月3日，他还给秘书林克写信，要找新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大字本读。在晚年，他的书房里、卧室的床上，总放着一本大字线装本的《共产党宣言》和两本战争年代出版的字很小、已很破旧的《共产党宣言》。因为字太小，他的眼睛看不清楚，就用大字本对着读。

除了读中文版，毛泽东还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从1954年起，毛泽东重新学英语，很想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英文版，他选的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的英文版比较艰深，生字比较多，学习困难不小。但是毛泽东坚持读，一直读到晚年，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用蝇头小字很仔细地作注，每次重读就补注一次。

为什么毛泽东读了一辈子《共产党宣言》？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说，1920年冬天，“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

周恩来：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

周恩来1920年赴欧洲之前就读过

《共产党宣言》。这一年，周恩来22岁。1921年3月，他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入党。1922年8月，周恩来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说：“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我们必须预备着，从事着，也永远不许忘掉。”

后来，周恩来多次读《共产党宣言》。1943年，他在延安读过《共产党宣言》，还在封面上亲笔签名。至今，德国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仍珍藏着这本书的复制本。

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印了2次共2000余册，后来由于斗争环境异常残酷，这个版本一度散失不见。找回这个珍本，是周恩来心头一直牵挂的大事，直到逝世前夕。

1975年1月，罹患癌症的周恩来抱病参加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见到陈望道，关切地问：“《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有没有找到？”陈望道摇了摇头。周恩来叹道：“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啊！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同年秋天，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被发现。

为什么周恩来如此钟情《共产党宣言》？1946年9月，周恩来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说，五四运动后的一个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很短时间，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

刘少奇：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

刘少奇1920年第一次读《共产党宣言》。这一年，刘少奇22岁。1920年10月，刘少奇在湖南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准备赴俄。

当时，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

言》中文全译本出版不久，就成了刘少奇手不释卷的日常读物。尤为幸运的是，刘少奇还和其他同学一起聆听过陈望道讲解《共产党宣言》。

1921年8月，刘少奇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课程。这年冬天，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旅莫中国学生中发展组织。

要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刘少奇回忆说：“那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自己是否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

于是，刘少奇第一批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终其一生，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定如初。他说：“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朱德：《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是非读不可的。

朱德1922年在德国入党后才第一次读《共产党宣言》。这一年，朱德36岁。

朱德曾是滇军名将、护国中坚，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一度令他苦闷彷徨。1922年9月，他远赴欧洲寻找出路，11月在德国经周恩来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德国，朱德勤奋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共产党宣言》的次数最多、时间最长。

从入党时起一直到逝世前夕，朱德读了一辈子《共产党宣言》。他说：“常言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是非读不可的。”

1976年5月，依据德文版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新译本”送中央领导审阅。这时的朱德，年届90高龄，眼睛花了，精力大不如前，读书很吃力。但他坚持一口气读完，随后提出登门拜访主持翻译工作的成仿吾。5月21日，朱德来到中央党校，对年近80岁的成仿吾说：“我看见你

的书，很高兴。这本书很有意义，对世界都有意义，我们有些什么问题搞不清楚，都要请教马克思，要看这本书。”这年7月6日，朱德逝世。弥留之际的他，仍念念不忘：“革命到底。”

邓小平：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邓小平1920年10月抵达法国，在随后的勤工俭学岁月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书籍，其间第一次读《共产党宣言》。这时的邓小平，还不满20岁。1923年6月，邓小平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后来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都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1926年1月，邓小平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说：“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

邓小平多次向人推荐《共产党宣言》。1929年，他在领导百色起义期间，向李明瑞推荐《共产党宣言》等书刊。

1965年8月9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共青团工作汇报时说：“大学生还可以读一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等。马列经典著作要选读得宽一些，知识面要搞得广一些。”

到了晚年，邓小平仍念念不忘《共产党宣言》。1987年8月29日，刚刚度过83岁生日的邓小平欣然接受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赠送的一本书——新出版的《共产党宣言》。

他常说：“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这一年，《共产党宣言》也170岁了。它蕴含的信仰味道，历久弥新而醇厚，经久不衰而隽永。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读着它，不断续写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新篇章。

我们生活在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应该再读一读《共产党宣言》，品一品信仰的味道，想一想：我们为什么出发？牢记着革命者的使命，想一想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怎样才能做一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合格答卷人？

（摘自2018年5月4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 靳铭

延安期间，任弼时工作繁重，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但不管怎么忙，他都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经常抽出时间深入农民家庭，问寒问暖，帮助解决困难。在他看来，革命不是为个人的利益，也不是为个人的名誉地位，而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求解放、谋利益，必须“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

盛夏的一天下午，任弼时走出办公窑洞，出来园的大门向平川里走去，一路上只见满川的玉米晒黄了叶子，心里不免焦灼不安。正巧碰上几个农民在浇地，可水流很小，半天也浇不了一块地。任弼时走上前询问，才知老乡们浇地的水渠年久失修，到处渗漏。他发现水源没问题，只要修好渠，就可以解决农民的燃眉之急，他立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表示同意并交任弼时负责。于是机关干部全部出动，日夜奋战，没用一周，一条长6公里、宽4米的大渠就修成了，枣园周围1400亩的土地当年受益。水渠修好后，村民们引水浇地，干枯的庄稼又恢复了勃勃生机。人们非常高兴，给这条渠取名为“幸福渠”。

一天，天色已晚，任弼时骑着马回枣园，遇见一些农民扛着锄头回家。当得知农民们正在抗旱除草，非常辛苦，所以才干到这么晚，于是他策马掉头，在农民干活的地上跑了一圈，仔细观察。第二天，他带着一大批干部战士扛着锄头来到地里。农民直喊：“这怎么行？你们都是办公室、办大事的，这点小事也惊动你们，叫我们怎么过意得去？”任弼时笑道：“这也是公事和大事呀！”他戴上大草帽，挎一壶水，提着锄头带头到地里干了

党费制度的最早规定

□ 王建柱

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第一个党章。二大党章列有“经费”专章，这是我们党关于党费制度的最早规定。该党章明确规定了党员交纳党费的标准、收支权限和纪律要求。二大党章规定：“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作为一项纪律，二大党章严

格规定：党员“欠缴党费三个月”必须开除之。之后的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党章基本上延续了二大党章关于党费的有关规定。从中共五大开始，交纳党费成为党员的一项基本义务，并在之后的历次党章中加以强调。

（摘自2017年第5期《世纪风采》，原标题为《党费制度：“红账本”中的红色情怀》）

和青少年教育促进会。20年来，他应邀到大中小学作励志报告400余场，用女儿的成长故事感动了10余万青少年；资助90余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创办了“金慧故里老来乐”服务队，照顾10多位孤寡和空巢老人……

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捧读这些家书，我们可以触摸到先辈们笔下流出的热血和激情，他们把民族独立、人民幸福置于个人、家庭之上，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气节和崇高的牺牲精神；可以感受到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是怎样坚守初心使命，实现政治理想的；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理解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密码。

（摘自2020年7月1日《光明日报》）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收藏了自明末清初以来的五万余封家书，红色家书约占五分之一，时间跨度为一个世纪左右。红色家书展示了不同时期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和心路历程，具有鲜明特色：挺立时代潮头，追求光明进步，勇于担当奉献，牺牲小我、成就大我……这些家书背后，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接力奋斗的辉煌历史。

1926年11月6日，时任叶挺独立团某部政治指导员的陆更夫给远在四川叙永老家的五弟写了一封家书，透露出对家人的强烈思念：

……要是我回家也很容易，不过我现在不能回来！我很久没有得到家信了，然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久我该可以决定交信地点，决定时再通知你！父亲现在何处？我不知信该交什么地方！母亲近来想也安好无恙！我现在的身体很是安健，能吃苦！不害病，这是母亲和你们都喜欢的！

令人遗憾的是，从16岁离开家乡到成都读书，直到26岁被捕牺牲，10年时间里，陆更夫再也没能回到朝思

家书故事映照如磐初心

□ 张 丁

给母亲的家书中说：

10年的革命锻炼教育了我，我完全明白我这10年的斗争是无比的光荣、伟大，我忍受了一切艰难困苦，在生死的危机情况下进行着顽强的流血的斗争，这是为了母亲、弟弟的永远解放。为着母亲的幸福，为着全人类的自由解放我情愿以死杀敌，我的光荣正是母亲的光荣，全家的光荣。

一个多月之后，许英在辽沈战役中牺牲。这封家书是战友从烈士衣兜里发现的。

数十年来，许英的侄子许卓亮精心保存着伯父的家书手稿，深感受

染。他先后入伍、入党、提干，多次立功受奖。2018年，许卓亮从部队退休后，回到老家河北省饶阳县良见村，在家中老屋的遗址上翻建新房，取名“家史馆”，把许英烈士的家书等家史资料陈列其中，供家族成员参观学习、传承家风。

1994年“七一”前夕，何显斌给正在湖北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读书的女儿何金慧写信：

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你是否应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

念、人生观。

1997年2月23日，何金慧写下入党申请书，第二年7月1日如愿入党。在她的建议下，家里三位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2001年，何金慧不幸去世，父母连续4年，坚持每年为她交纳1000元党费，以此延续她的政治生命。何金慧成绩优异，思想进步，被称为“哲学女孩”。她去世后，留下了数百封书信、几十本日记，成为新时期大学生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典范。何显斌主动从荆门市东宝区教委主任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助学基金

